

农村改革研究

■叶祖成 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改革農業縣域經濟
增強我國綜合國力

陳俊生

二〇〇三年十月

深化改革，縮減並修改爭，促進現代化。

裴之白
音書

藏在西藏的毛泽东——《西藏访问记》，

内容涉及农村经济生产，民族政策，西藏问题。

农村经济问题在于农村工作所关心关心的问题

问题。叶波成同志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阐述

丰富，平易和朴实，十指紧扣心相连，丝丝入扣

结硕果，语言形象非常。尽管善于向别人介绍

还有稍有不同是也，这正好标志着毛思想，相互碰撞，

以期使人们的人认识愈益接近真理。我愿作

李在党的理论指导下，为治化建设改革，再鼓

劲，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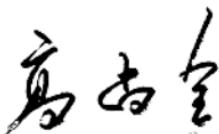
董家邦

一九三二年一月

序

由叶祖成同志撰写的《农村改革研究》这本书，比较系统、全面地反映了深化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新鲜经验。作者把嘉定作为自己的实践基地和研究对象，根据中央不同时期的改革方针政策，结合农村改革和发展中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经验，进行多方面和多层次的精心研究，从发展战略思路到具体对策研究，从农村改革到城市建设，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单一农业结构到农工商综合经营，从分散经营到适度规模经营，从小生产方式到农业现代化建设，从探索外向型经济到发展私营经济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周详的调查研究，文章从改革开放的实际出发，既立足于解决嘉定的实际问题，又把研究的问题放到上海郊区乃至全国的大局来考虑。因此，许多观点和经验在改革实践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县级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担负着国家政权、社会治安、精神文明建设的职能，而且担负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决策、县级经济要素的合理配置和开发的职能，担负着对全县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事业发展和管理的职能，更是组织和领导农村综合改革的最佳层次和关键部位。可见，重视对县级经济改革和发展研究工作十分重要。各地可借鉴嘉定多年来农村改革研究的实践经验，抓住农村事关大局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矛盾和问题，大胆探索，精心研究，加强改革力度，这对增强县级活力，加快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使广大农民尽快富裕起来，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993年12月4日

序

《农村改革研究》这本书，收集了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县域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叶祖成同志有关农村改革与发展方面的文章37篇，较全面地、系统地反映了他在农村改革开放的洪流中，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遵循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联系广大农村的实际情况，勇于探索，不断创新，形成了一批内容丰富，资料翔实，通俗易懂，适合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阅读的研究成果。

叶祖成同志从事农村经济和县域经济研究工作40余年，亲身参加土改、合作化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村经济变革的全过程有较深刻的了解，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写作能力，并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撰写了一大批具有较高水平、对实际工作又具有指导性的文章，这不仅在上海郊区有较高的知名度，而且

在全国同行中亦有较大的影响。

《农村改革研究》一书，比较系统地探索、实践和总结了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特别是研究和推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查和提出合理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的设想，拟订了一系列放宽农村经济政策和措施，探索和试验人民公社的体制改革，总结和探索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研究和试行乡镇企业内部的记件工资制和审计制，探讨和组建以上海嘉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的一批工业企业集团，并探索和总结农村城镇化，加速城镇建设的战略思路、发展目标、对策等方面的新经验。

叶祖成同志参加过多次大型农村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1980年国家农委统一组织的全国11个县农村经济调查，由叶祖成主稿的《嘉定县农业生产结构调查报告》，以求实创新的精神，全面系统地剖析了当时生产结构的现状和矛盾，提出了合理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的设想，敢于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在农村经济领域的长期束缚，促进了农村经济的飞跃。该文被收进国家农委1980年8月编印的《上海市农业经济调查》文集。

1991年4月受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委托，由叶祖成同志担任课题组组长所完成的《九十年代

嘉定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是一份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报告。在综合开发研究院召开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上，由马洪等著名专家学者组成专家评议小组予以认真评审，一致认为该研究报告内容完整，思路正确，体现了研究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对嘉定今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农村改革研究》一书，有不少独到见解，从实践中来，经过理论概括和提炼，使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紧密结合，文章可操作性强；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提出许多重要的政策建议，得到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和采纳；在文风上，各篇文章主题突出，观点鲜明，思路清晰，论据充实，文字流畅，并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用大量事实说明党的基本路线、改革开放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1993年11月2日

目 录

陈俊生题词

裴先白题词

董家邦题词

序
序

高尚全
逢树春

按照国内外市场需求，合理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1)
“包”字里面潜力大.....	(12)
联产承包制何以能在上海市郊生根开花.....	(18)
这是一条宽广的道路	
——嘉定县农业联产承包制的调查.....	(21)
农工商综合经营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	(32)
党、政、社三家并列模式利少弊多.....	(54)
发展商品生产的一条新路——联合之路.....	(58)
农商结合联营副食品的构思.....	(64)
发展创汇农业的新型商业形式.....	(67)
乡级合作经济体制模式的探讨.....	(71)
初探城郊经济的地位与功能.....	(75)
珠江三角洲创汇发展农业的考察.....	(81)
农村经济改革八年回顾.....	(91)

略述党委书记在决策中的作用	(100)
发展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我见	(103)
把计件工资制引进乡镇企业	(108)
乡镇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的初步构思	(112)
乡镇企业产权制度的一种新形式——股份合作制	(116)
乡镇企业内部审计工作初探	(121)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的研究	(126)
乡镇工业走出困境的浅见	(133)
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新途径	(139)
电光源行业联合问题的可行性研究	(145)
完善乡(镇)集体经济组织机构的研究	(150)
展望1991年农村经济改革	(156)
90年代嘉定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160)
试析出口和内需并举的外向型经济模式	(187)
不断完善企业集团的组织结构	(192)
蔬菜产销体制改革的研究	(195)
国营大中型企业与乡镇企业机制的分析比较	(210)
县级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设想	(218)
浅析中国乡镇企业的地位和作用	(225)
改革计划体制 促进经济发展	(233)
农村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239)
嘉定城的城市性质、建设目标及实施对策的研究	(246)
乡镇企业增活力促发展的一种有效形式	(255)
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研究	(258)
后记	(265)

按照国内外市场需求 合理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嘉定县位于长江口的南岸，上海市的西北部，中心位置在东经 $121^{\circ}15'$ ，北纬 $31^{\circ}23'$ ，全县496平方公里，49.62万人口，其中农村人口40万，农村劳动力25.17万，耕地48.59万亩，其中集体耕地44.95万亩。农业人口每人平均拥有耕地1.21亩，每劳力负担耕地1.93亩。全县有19个人民公社，249个大队，2398个生产队，4个县属镇。

嘉定县处在亚热带边缘，长江冲积平原，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为 15.5°C ，年降雨量为1100毫米，无霜期224天左右。境内地势平坦，河道纵横，土壤肥沃。东南部与市区接壤，交通便利，工农城乡之间联系密切。

嘉定县不仅地理、自然条件优越，而且集约经营的水平历来较高，集体化以来集体经济发展较快，尤其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县工、副业迅速发展。1979年，全县农村人民公社农、副、工三业总收入50011万元，净收入23914万元，比1965年分别增加3.37倍和2.27倍。社员分配人均320.56元，劳动力人均500.73元，分别比1965年增加1.1倍和0.7倍。

农业生产结构的现状和矛盾

解放30多年来，嘉定县农业生产结构的演变，有其合理的一

面，这主要表现在：（1）农林牧副渔五业都有较大的发展。50年代，嘉定县的农业基本上是单一的种植业经济，林牧副渔在整个农业的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不到四分之一。进入60年代以来，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来，牧、副业迅速发展。以1975年不变价计算，1979年全县农业总产值比1965年增长74.7%，其中牧业、副业比1965年分别增长2.9倍和3.6倍。林牧副渔四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65年的22%上升到50.7%。（2）全县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各种作物的播种面积有所变化，但粮食、棉花、油菜和蔬菜四大主种作物的总产量还是逐步上升。粮食1949年全县总产14600万斤，50年代年平均16925万斤，60年代年平均25448万斤，70年代年平均35408万斤，10年增产分别为8500万斤和1亿斤，平均每年增产为850万、1000万斤，1949年至1979年粮食每年递增3.1%。棉花每年递增4.6%，油菜每年递增5.3%，蔬菜从1975年算起，每年递增3.9%。（3）饲养业和其它副业生产大量发展。1979年全县生猪饲养量达73.66万头，上市量达38.84万头，比65年分别增长77.2%和23%，比1957年分别增长5.8倍和11.7倍，家禽饲养1979年达356.7万只，上市量245.7万只，比65年分别增长27倍和65倍。黄草、蘑菇、香菇、蚌螺等新老副业生产同时发展，出口创汇大大增加。

但是，嘉定县农业生产结构同时存在着违背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两个突出矛盾：

第一，粮田复种指数过高，农民种三熟制得不偿失。

嘉定县50年代是实行稻麦两熟制的；60年代初试种粮食三熟制，1969年起大面积推广，至70年代中期全部实行三熟制，而且几乎都是二水一旱的麦、稻、稻或油、稻、稻。近5年来粮食复种指数均在265%以上，粮食复种指数之高，在郊区10县中名列前一二位。

粮食全部实行三熟制后，粮食总产有所增加，但弊端丛生，

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季节矛盾突出，劳动强度大大提高。嘉定县全年积温约5601℃，一年种两熟，约需积温5200℃，一年种三熟，扣除秧田积温约需5500℃。所以从积温上看，种两熟较宽裕，种三熟很紧张。据市、县气象和农业部门反映，70年代比60年代平均气温低37.3℃。在70年代的10年中，早稻因“倒春寒”而造成较严重烂秧的有3年；后季稻因“寒露风”而影响扬花灌浆，造成程度不同穗头而低产的有6年。常年积温不足的矛盾主要在后季稻上，所以群众叫后季稻为“风险稻”。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后20年将进入低温年代，这对三熟制风险就更大。比如，1980年由于春天低温多雨，夏熟作物成熟推迟了一个星期，结果早稻、后季稻插秧都误了季节，后季稻抽穗灌浆时又遇低温多雨，普遍出现穗头不沉头，亩产是历史最低水平。

粮食实行全部三熟制后，从早春到晚秋，一直有嫩绿的禾苗，十分有利于害虫和病菌的孽生繁殖，造成病虫害世代重叠，交替发生。嘉定县在70年代早稻的纹枯病和后季稻的穗颈稻瘟病，以及纵卷叶虫等，发生、大发生年份均在3年以上，因此可以说，种粮食三熟制在避开灾害性天气、减少病虫害发生上不能扬长避短，相反是风险太大。

粮食实行全部三熟制后，全县粮田用工量共增加459万工（按标准劳动力计算，以下同）。在三夏、三抢、三秋三个大忙季节，劳力紧张。尤其是在三抢时期，社员在36℃至37℃的高温下劳动，每天长达五六个小时，辛苦程度高，影响身体健康，影响干群之间及务农和务工社员之间的关系，也是造成务农社员不安心农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2.用地养地关系失调，土质日趋恶化。粮食实行二水一旱为主的三熟制后，加上水稻种植面积扩大，豆科作物面积减少，改变了原有的用地养地结合、水旱轮作的传统耕作制度。70年代

豆科作物种植面积，由60年代占集体耕地面积（不包括固定蔬菜田）的26.2%下降到18.4%；水田耕作次数增加，土地浸水时间延长，全年浸水5个月以上的面积占集体耕地面积（不包括固定蔬菜田）的48.1%，浸水2次的水田面积占水稻面积的68%。土壤湿害加剧，结构性状下降，土壤中水、养、气、热不协调，损害了土壤的物理结构和养份释放，造成土地发僵，犁底层增厚，部分耕地还产生了次生青泥层，影响了作物的生长。

3. 粮食实际增产不多，经济效益更差。嘉定县60年代以两熟制为主，1966年总产最高。70年代实行全部三熟制，1976年总产最高，看统计数字，1976年比1966年总产增了1亿多斤，但具体分析一下，种双季稻比单季稻实际增产的粮食并不多。全部种双季稻后，秋粮只增了5554万斤，占增产部分的53.2%。在秋粮中，1976年比1966年增产的是成品粮折率较低的籼谷，而折率较高的梗谷减少了；再扣除秋粮种双季稻多用种子1000万斤（早稻以40斤1亩计算，共增加用种600万斤；后季稻以每亩比单季稻多用20斤计算，增加用种400万斤），所以两年秋粮折成成品粮（1966年按77%，1976年按71%折算）只增1808万斤，比1966年增产9.8%。在增产的成品粮中，有一部分还是靠2万亩“帮忙田”增产的。

种三熟制，由于化肥、农药、种子等用量成倍增加，造成高产高成本，增产减收。将1966年和1976年每亩夏粮、秋粮经济收益情况相比，夏粮是增产增收的，但秋粮是增产减收的，每亩秋粮的净收入减少，用工却增加，两项合计多支出部分等于每增1斤籼米亏本0.56元。

第二，养猪饲料负担过重，畜牧业生产和粮食生产比例严重失调。

进入60年代以来，嘉定县猪禽杂食动物的饲养量急剧上升。猪禽的大幅度增长，所需的饲料粮越来越多，除了市里按政

策提供的饲料外，县内提供的饲料粮占粮食总产量的比例越来越大，饲料粮占余粮（除征购粮、口粮、种子粮后多余部分）的比例逐步扩大。现把3个年代平均县内提供的养猪饲料（不包括副产品）列表如下：

年 代	粮豆总产量 (万斤)	饲料粮 (万斤)	占总产 量%	饲料增长数占产 量增长部分的%	占余粮的%
1953—1959年平均	18100	667	3.69		
60年代年平均	25448	3003	11.8	31.8	76.2
70年代年平均	35408	7809	22	48.1	87.3
1979年	36849	9488	25.75	47.05	109

1979年全县共用各种饲料18050万斤，其中县内提供的饲料为9488万斤，全县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一作了饲料，在郊区10县中是比例最高的一个县。提供的饲料粮，超过二留一购后余粮的9%。70年代中每年增产的粮食，有48%是被猪吃掉的。在一定的粮食生产水平下，种植业所能提供的饲料数量是有限的，饲料的需要量超过了本县种植业所能提供的可能，就产生了以下几个问题：

1. 粮食生产的增长，跟不上口粮、饲料、种子的增长，全县粮食出现了缺口。70年代粮食产量比60年代年平均增产近1亿斤，但口粮、饲料比60年代年平均分别增了4000万斤和4800万斤，种子留粮因全面实行三熟制后比六十年代年平均增了1000多万斤，结果产量“一增”抵不上口粮、饲料、种子“三增”，全县粮食大帐年平均仅多余26万斤，勉强摆平。实际饲料多用，加上损耗、虚报，这大帐就更摆不平了。全县有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经常出现亏空，要向国家和兄弟队借粮接济。

2. 动用储备粮，储备粮成了饲料粮、周转粮。60年代全县

共提储备粮5690万斤，从未动用过。至1974年时，全县结余储备粮近7000万斤。但是从1975年以来，由于每年的饲料用粮已达9000万至1亿斤，所以5年中除了1976、1978年略有储备外，其余3年动用储备粮都超过1000万斤，1979年度分配后储备粮已减少到4761万斤。目前除了国家代保管的3049万斤储备粮是实数，其余的1710万斤储备粮中，80%是虚数，只是帐上有粮，实际粮食已被生产队垫支饲料或口粮。

3.国家垫支粮食不断增加。由于禽蛋生产的饲料政策是以禽换料、以蛋换料，生产单位是先支出后结算，一部分饲料先由国家垫支解决。经营好的单位，能够归还，经营差的单位，无力归还，每年结算时，归还数少于垫支数，全县国库垫支的粮食就越来越多。至1979年底，全县垫支各种饲料粮共1959万斤。今年垫支又有增加。

4.饲料粮挤了口粮，社员增产不多吃。在粮食有缺口的情况下，留足饲料就影响口粮，留足口粮就影响饲料，发生了人猪争粮的矛盾。群众的说法是：“小耳朵”的粮食给“大耳朵”吃掉了。口粮水平70年代平均每人556.5斤，比1953年—1959年七年平均每人532.7斤增加22.8斤，而70年代的农村劳动力比50年代要多12万人，14岁以下的儿童数却比50年代后期要少4万多人。加上70年代口粮中分配了一部分折率低的籼谷，所以实际口粮并未增加。分到每个农业劳动力身上，一般要比五十年代减少10—20斤。又由于种三熟制，劳动程度大，每个农业劳动力比种两熟制时多消耗主粮20多斤。

5.形成畜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食粮动物增长，食草动物普遍下降，特别奶牛生产，公社化以来长期得不到发展。